

政治家诗人

的心路实录

毛泽东诗词谈

冯锡刚 著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威望高人

老心靈休休



卷之三

卷之三

A841.4/5

2007

政治家诗人
的心路实录

毛泽东

诗词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政治家诗人的心路实录——毛泽东诗词谈/冯锡刚著。
—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7.5

ISBN 978 - 7 - 5073 - 2276 - 7

I. 政… II. 冯… III. 毛泽东诗词研究 IV. A841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4826 号

著 者：冯锡刚

责任编辑：于俊道

装帧设计：徐 娅

政治家诗人的心路实录——毛泽东诗词谈

冯锡刚 著

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

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：100017

北京市高迪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：260 千字 开本：A5

印张：10.625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5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073 - 2276 - 7

定价：22.0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 诗海蠡测

也谈毛泽东的七言律诗

——兼与安建设先生商榷 /3

“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”

——毛泽东与民歌 /15

庄子·屈原·李贺

——毛泽东诗词浪漫主义渊源浅议/27

男儿有泪不轻弹

——毛泽东诗词中的泪 /37

山：毛泽东的人格自画像

——《十六字令三首》及其他 /46

人民英雄颂

——《蝶恋花》及其他 /57

“沁园春、水调有歌头，羌无偶”

——毛词双璧：咏雪词与游泳词 /69

“《离骚》屈子幽兰怨”

——《七律·和柳亚子先生》“牢骚”新解 /86

“吓倒蓬间雀”

——读报诗与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 /96

“梅花笑，苍蝇抖”

——毛泽东的自寿诗《七律·冬云》 /105

“吊罗”与“批林”

——再谈《七律·吊罗荣桓同志》 /111

“有多少风流人物”

——《贺新郎·咏史》及其它 /123

井冈山情结

——1965年井冈山词二首 /135

毛泽东诗词手迹谈 /145

也谈“毛泽东诗词”中的真伪

——兼与邓遂夫先生商榷 /165

第二辑 诗人之交

聆读再三咏新篇

——毛泽东与朱德的诗交 /175

“语长心重，兴婉而微”

——毛泽东与董必武的诗交 /184

“我从延水识群英”

——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诗交 /193

“一读骚经一肃然”

——毛泽东与叶剑英的诗交 /201

诗人的对话

——毛泽东与陈毅的诗交 /209

“气度雍容格调高”

——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五次唱和 /226

- “诗难，不足为外人道”
——毛泽东与胡乔木的诗交 /235
- “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”
——毛泽东与鲁迅的诗交 /247
- “诗人兴会更无前”
——毛泽东与柳亚子的诗交 /257

第三辑 诗友之论

- “看诗词大国推盟主”
——陈毅论毛泽东诗词 /275
- 经纶 诗词 泰斗
——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 /287

第四辑 诗言志

- 愤怒出诗人
——毛泽东 1965 年诗词纪事 /307

后 记 /330

第一辑

诗 海 蠢 测

也谈毛泽东的七言律诗

——兼与安建设先生商榷

拜读安建设先生的《略论毛泽东的七言律诗》（载《党的文献》2002年第5期，以下简称《略论》），获益良多。作者依据第一手材料，有对创作时间的考证（如《洪都》），有对创作过程的分析（如《有所思》）。更富于启迪意义的是，《略论》从一个新的角度（笔者囿于见闻，在诸多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文字中，似乎还未见有专从七律这一诗体的角度来作分析和研究的），对毛泽东诗词研究作了富有开拓性的思考。

笔者想沿着《略论》的思路，对毛泽东的七言律诗略陈管见，即便有入室操戈之嫌，亦在所不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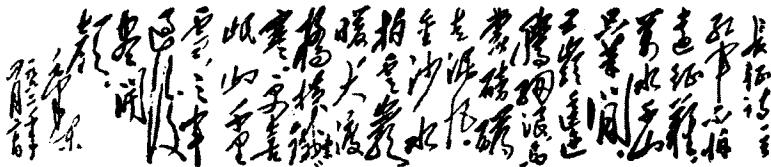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创作阶段的划分

《略论》为分析毛泽东七律创作的过程及其特点，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。这里最大的问题是：一、将同作于1949年4月的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与《和柳亚子先生》划入两个阶段的理由是什么，似未说清；二、将第二、三阶段的分界划于《和周世钊同志》与《送瘟神》之间，其依据亦缺乏说服力。

这就涉及到划分阶段的标准问题。

为一位创作家的创作划分阶段，为的是研究其创作变化及特点。因此，必须从创作家自身的特点去考虑。郭沫若在论及毛泽东诗词时有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诗：“经纶外，诗词余

事”。集革命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与诗人于一身的毛泽东，毫无疑问，首先是革命家。正因此，毛泽东并未也不可能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诗词创作中去。得之于早年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深厚学养，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，兴之所至，通过诗词来表情达意。毛泽东称自己的诗词是“在马背哼成的”，真是传神，洵非虚言。同时，毛泽东又是一位创作严谨的诗人，并不以数量之丰自娱。有限的篇章自然给阶段的划分带来一定的困难。例如，毛泽东的早期创作理应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，《略论》将1917年夏所作《泛朱张渡》与三四十年代创作的《长征》、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合为一个阶段，显然是由于诗人20年代之前留存的作品仅此一篇，不宜构成一个独立的阶段所致。但这样归併显然是不妥当的。



1962年4月20日，书赠卫士长李银桥的长征诗墨迹

基于上述考虑，笔者以为应以作者的革命历程为主要依据，主要从创作题材与主题的变化上去划分阶段。具体来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，自《长征》到《和柳亚子先生》。《泛朱张渡》可以忽略不计，理由是：首先，它出自毛泽东早年友人的回忆，缺乏文字依据；其次，仅有六句，为残篇。《和柳亚子先生》以划入第一阶段为宜。此篇与《长征》和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相比较，虽非直接取材于重大的历史事件，似乎只是以挽留柳亚子先生而显现两位诗人革命家之间的私交色彩。其实不然，这正展示出诗人作为大政治家“经纬万端，各得其宜”的本色，可以作为毛泽东为筹建新中国而日理万机的一个艺术写照。如果从毛泽东所总结的中国革命胜利的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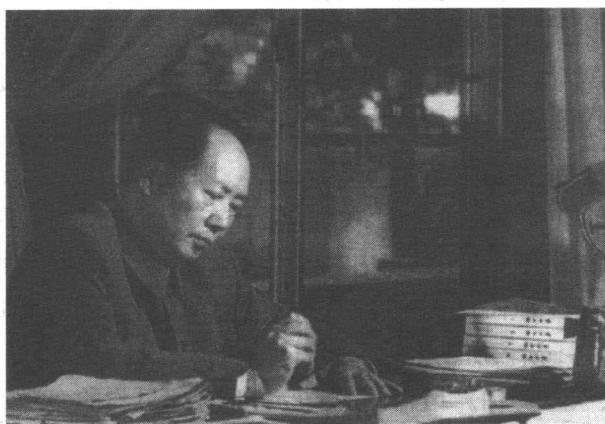
大法宝之一“统一战线”的角度来解读，那么这首七律所表现的也还是一个重大的主题。艺术起于至微，往往以小见大的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。

第二阶段，从《和周世钊同志》到《登庐山》。《和周世钊同志》是毛泽东开国之后创作的第一首七律，生前未允公开发表，多半是出于艺术追求的缘故。《略论》对此篇评价甚高，与《和柳》相提并论，似不妥。这既不合诗人的本意（一般说来，作者的自我评判应作为研究者的重要依据或参考），也不合作品的实际。仅仅是由于这两篇均系和作而归入同一阶段，依据不足。至于认为《和周》的唱和对象是毛泽东早年的同学兼同乡，故诗人不愿公之于世，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，但如果考虑到诗人将1961年与周世钊的第二次唱和以《答友人》为题收入1963年12月公开出版的《毛主席诗词》的事实，那么作于1955年的《和周》既未列入发表于1957年出版的《诗刊》创刊号上的《旧体诗词十八首》，亦未收入1963年版的《毛主席诗词》，则显然主要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。胡乔木主持编辑的《毛泽东诗词选》将其列入副编，并在致有关人员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表示：副编其实就是艺术水准与正编不在同一档次的婉词。胡乔木设置副编是很有见地的。这一阶段所创作的《和周》连同《送瘟神》两首、《到韶山》、《登庐山》诸篇，主要取材于神州风物的变迁，着力表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建设新世界的精神风貌。

第三阶段，则以1959年10月开始创作的《读报有感》为发端，直至1973年的压轴之作《读〈封建论〉呈郭老》。《略论》将《呈郭老》单列为一个阶段，可能是出于与《有所思》相隔时间较长（足有7年之久）的考虑，加以艺术水准与“在意境、手法等方面确实达到了‘颠峰’”的《有所思》判然有别——“这首以‘批孔’为主题的诗已谈不上什么诗意”这样一个因素。笔者完全同意《略论》对《呈郭老》的评价，

但对《有所思》的推崇则难以苟同。笔者将《呈郭老》列入第三阶段，不只是考虑到仅此一篇殊难构成一阶段，更重要的是，此诗在主题上完全与《读报有感》以来所着力表现的“反修”一脉相承（“文革”是“反修”合乎逻辑的恶性发展），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是《读报有感》开启的主要诉诸逻辑思维或“直说”这一为毛泽东本人所针砭的“味同嚼蜡”的极端表现。

当然，划分以上三个阶段只能就其主体而言，此中难免有逸出于主流之外的别样的浪花。例如，第三阶段中有 1961 年创作的《答友人》这样“形象极其壮丽，声调极其和谐，令人百读不厌”（郭沫若语）而并非纯以“反修”为旨趣的佳作。



60 年代前期在广州书写诗词

第三阶段从 1959 年 10 月至 1973 年 8 月，长达 14 年；第一阶段从 1935 年至 1949 年亦长达 14 年，但两者情况完全不同。第一阶段创作数量少，公开发表的仅三篇，《有田有地吾为主》是否为毛泽东所作尚是问题。毛泽东本人虽于 1965 年 7 月致陈毅的信中自谦地表示“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，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”，但作者屡将《长征》书为条幅以赠他

人，总是颇为自得的一种表露罢。《和柳》是毛泽东写得最好的七律之一，起承转合，富于情味，融今昔于一炉，寓哲理于形象，尽显政治家的本色和诗人的风采。柳亚子接读后一和再和，竟至二十余首，亦足见此诗的艺术魅力。要之，这一阶段数量虽少而质量甚高（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虽不被作者本人所看重，也许是议论胜于形象，但公允地看，全篇开阖自如，律对工稳，高屋建瓴，大气磅礴，堪推上品）。第三阶段创作数量达 11 篇，主题多为“反修”，亦间有《答友人》这样表达对故乡怀念和祝愿的动人篇章。数量既多，艺术水准亦难划一，既有《答友人》这样的精品，亦有《呈郭老》这样了无诗意的诉诸直说的“政论”。这 11 篇作品，作者生前公开发表的仅《和郭沫若同志》、《答友人》和《冬云》3 篇。《吊罗荣桓同志》在作者逝世二周年时经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布。胡乔木从政治的角度考虑，将其列入正编，当视为特例。此诗在作者生前未允公开发表，自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，但也不能完全忽略艺术水准上的因素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《毛泽东诗词集》将《洪都》、《有所思》列入副编，这秉承了胡乔木的慧识，完全得当。1963 年 12 月，在编辑《毛主席诗词》时，毛泽东曾明确指示：“其余反修诗、词，除个别可收入外，都宜缓发。”就七律而言，主题为“反修”的仅收入《和郭》与《冬云》，“都宜缓发”者系《读报有感》4 首。现诸多出版物所收只 3 首：《反苏忆昔闹群蛙》（1959 年 12 月）、《托洛茨基到远东》（1960 年 1 月）、《托洛茨基返故居》（1960 年 6 月）。但据最新资料披露，《读报有感》之发端却是作于 1959 年 10 月至 12 月间的这样一首：

西海如今出圣人，涂脂抹粉上豪门。

一辆汽车几间屋，三头黄牛半盘银。

举世劳民同主子，万年宇宙绝纷争。

列宁火焰成灰烬，人类从此入大同。

显然，作者是借诗词这种形式来表达作为政治家的诉求，诗味自然说不上，即令以律诗的平仄来衡量，亦不甚讲求。此后所作诸篇，亦大抵如此。然律对较为讲求，压轴之作最好：

托洛茨基返故居，不和不战欲何如？

青云飘落能言鸟，黑海翻腾愤怒鱼。

爱丽舍宫唇发紫，戴维营里面施朱。

新闻岁岁寻常出，独有今年出得殊。

领颈两联或出以比兴，或出以直陈，构思巧妙，对仗工稳。即便如此，作者仍将其置于“都宜缓发”之列。这固然有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（1963年9月开始发表“九评”，虽已点名批判赫鲁晓夫，但仍称其为“同志”，至1964年4月毛泽东提议与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联名电贺其70寿辰），更因艺术追求的严谨所致。

笔者将第二、三阶段界定在《登庐山》与《读报有感》之间，或许有人会以毛泽东1959年9月1日致《诗刊》主编臧克家和副主编徐迟的信为据，认为《到韶山》、《登庐山》两诗亦以“反修”为主题，因作者称“我这两首诗，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”。所谓“忘八蛋”是指“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”，似乎还包括“国内挂着‘共产主义’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”。诗人写此信时颇为激愤，但事后终究未允单独公开发表。个中原委，细读作品自可明瞭。这两首七律决非稍后如《读报有感》那样嬉怒笑骂的直接的政治诉求，而是出之以形象思维的艺术表达。尤其是《登庐山》，内有“云横九派浮黄鹤，浪下三吴起白烟”这样诗人自我评价亦好的佳句。两篇主题虽含有某种鼓吹现实政治的成分（要求一个政治家诗人写完全不关涉时事的作品是很难的），如对人民公社的赞美（但并非直说），但终究不是对政治的直接诉求。诗人以艺术品来看待和追求，故让胡乔木转请郭沫若提出修改意见以尽可能臻于完美。对《读报有感》诸篇虽亦示人，但决

无求改的意向。这种界限，作为诗人与政治家的毛泽东是把握得非常明确的。

要之，对毛泽东七言律诗创作阶段的划分，主要依据是创作题材及主题，当它与词作互为参照的时候，更其如此。至于诗人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和变化，自然不能不加注意，但这是一个甚为复杂的问题。内容与形式有关联，但也并非纯然的内容决定形式或形式服从内容。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，有它的不确定性。还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，作具体分析较为适宜。机械的划一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弊。

评价艺术作品，自然要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着眼。即令撇开主题这个因素，毛泽东第三阶段的七律创作，从总体上看，水平参差，虽不宜说每况愈下，但远未达于“颠峰”。当人们认同鲁迅小说的创作高峰是《呐喊》而非《故事新编》，认同郭沫若自己说的“《女神》之后我就不再是诗人”的自我评价这类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创作现象之后，那么对毛泽东诗词（其中包括七言律诗）的这种评价就不至于感觉奇怪了。

关于“被动式”与“主动式”

《略论》在论及《和柳》、《和周》这两首和作时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按照诗友之间赠和一般规矩：赠诗可以写得平一点，以期‘抛砖引玉’；而和篇的水平不能低于赠篇，至少两者要不相上下才行。”《略论》推崇这两首和作的水准“已不在律诗大家之下”，纵然如此，“由于答作的特性所决定，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诗仍属被动式的创作”。接着，《略论》对属于“主动创作”的《和郭》、《冬云》、《答友人》、《吊罗》、《洪都》、《有所思》诸篇逐一评价，认为“不仅意境高远，格调挺拔，手法也如行云流水”，“最能体现诗人的性格和魅力”，“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感情世界”。对《有所思》更是推崇备至：“当入毛泽东七律诗中的拔筹之作”。

有所思
六月六日
万里神都万里叶，
遥知南国春花相隔。
香飘向薰薰，深浅
浓淡似烟似霞。
一阵风雷引宇宙，
满街红绿是旌旗。
漫闻都听得雨，
七位人民齐所思。

1966年6月所作《七律·有所思》手稿

对毛泽东上述诗篇的评价，见仁见智，各有所好。这是文艺欣赏中的常见的现象。只是《略论》在上述所引中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。

首先是“赠和规矩”一说实未所闻。诗友赠作是否就一定期待对方的唱和，则既无有赠必和的所谓“规矩”，亦无约定俗成的心照不宣。写赠者怎么可能事前就存有一种“写得平一点，以期‘抛砖引玉’”的念头呢？“抛砖引玉”只是文人的自谦，怎么可能当真呢。除了特殊情况，又有哪一位创作家愿意将真自认为的“砖”抛出去丢人现眼呢。至于唱和者